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 反美主义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



YZLI0890146802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罗伯特·O·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 编著

朱世龙 刘利琼 / 译

谁在反对美国？为什么反对美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罗伯特·O·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 编著
朱世龙 刘利琼 / 译



YZLI08901458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美)卡赞斯坦,基欧汉编著;朱世龙,刘利琼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ISBN 978-7-300-14313-2

I. ①世… II. ①卡…②基…③朱…④刘…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337 号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

[美]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
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编著

朱世龙 刘利琼/译

Shijie Zhengzhizhongde Fanmei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1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6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如果与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朋友和同事就一本书的策划进行交流，则是对他们兴趣的有意思的考验。当我们开始向他们描述小国政治或者国际组织的程序时，他们通常便会兴味索然；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当代政治科学的一些抽象概念时，这种情况更甚。然而，当我们着手编著这本关于反美主义的著作时，他们突然对这本书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兴趣，而此前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是些研究深奥学问的无害的老学究。至少，美国人似乎关注反美主义。即使他们不相信“他们憎恨我们”，但是，对世界上许多人不信任美国和美国人这种现象，他们既感到困惑又感到担忧。“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们”这个问题在杜伦大学、伊萨卡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

研究这样一个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课题令人鼓舞。然而，这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人通常会对它怀有固有的观念或者偏见，而且它们很难祛除。“反美主义”这个概念通常夹杂着政治色彩。我们不得不反复询问普通人和大众对我们研究课题的认识。例如，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反美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忘了，直到伊拉克战争前夕，民调一直显示世界范围内的亲美情感远远超过反美情感。其他人则特别将反美主义与法国这样的国家联系起来，且偶尔错把法国精英的观点和情感当成了大众的观点和情感。或许最糟糕的误解发生在大学校园内：那些没有研究过该课题的学者们，急切地对反美主义发表他们所热衷的片面的解释——反美主义或许是源自对美国的憎恨、精神病态，或者源自小布什总统及其政策。

然而，我们认为，对于反美主义不存在一种权威解释。正如本书书名所

显示的，我们甚至认为，反美主义没有构成一种同质性现象，它原则上可以通过简洁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区分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反美主义，最后才以“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来冠名。我们坚持认为，理解反美主义具有不同类型才是研究这一课题智慧的开端。

我们首先要感谢本书的其他作者。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我们要求部分作者对已经非常完善的章节草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同时，我们对他们在繁忙的常规学术年中表现出来的良好精神风貌深表感激，而我们却在休学术年假。

我们还要感谢下列人士就本书不同草稿所做的有益交流和尖锐的评论。他们是：拉维·阿布德劳尔 (Rawi Abdelal)、维诺德·阿加沃尔 (Vinod Aggarwal)、纳兹尼恩·巴尔马 (Naazneen Barma)、蒂莫西·伯恩斯坦 (Timothy Byrnes)、拉斯-埃里克·希德曼 (Lars-Erik Cederman)、凯伦·乔杜里 (Kiren Chaudhry)、杰夫·T·切克尔 (Jeff T. Checkel)、汤姆·克里斯坦森 (Tom Christensen)、卡西·戴维森 (Cathy Davidson)、戴尔·艾克尔曼 (Dale Eickelman)、菲利普·埃弗茨 (Philip Everts)、佩奇·福特纳 (Page Fortna)、彼得·A·古雷维奇 (Peter A. Gourevitch)、彼得·哈斯 (Peter Haas)、彼得·霍尔 (Peter Hall)、奥尔·霍尔斯特 (Ole Holsti)、唐纳德·霍罗威茨 (Donald Horowitz)、约翰·埃肯贝利 (John Ikenberry)、布鲁斯·詹特森 (Bruce Jentleson)、玛丽·卡赞斯坦 (Mary Katzenstein)、南纳尔·基欧汉 (Nannerl O. Keohane)、加里·金 (Gary King)、皮奥特·科斯基 (Piotr Kosicki)、斯蒂芬·D·克拉斯纳 (Stephen D. Krasner)、戴维·莱克 (David Lake)、杰夫·勒格罗 (Jeff Legro)、戴维·莱昂尼 (David Leheny)、安德雷·马科维茨 (Andrei Markovits)、罗斯·麦克德莫特 (Rose McDermott)、巴拉克·门德尔松 (Barak Mendelsohn)、约翰·迈耶 (John Meyer)、海伦·米尔纳 (Helen Milner)、莱娜·莫斯利 (Layna Mosley)、诺曼·奈马克 (Norman Naimark)、约瑟夫·S·奈 (Joseph S. Nye)、路易斯·保利 (Louis Pauly)、托马斯·瑞斯 (Thomas Risse)、约翰·杰拉德·鲁杰 (John Gerard Ruggie)、罗伯特·萨特洛夫 (Robert

Satloff)、格布哈特·舒威格勒 (Gebhard Schweigler)、凯瑟琳·辛金克 (Kathryn Sikkink)、杰克·斯奈德 (Jack Snyder)、贾尼丝·斯坦 (Janice Stein)、雅科夫·韦茨伯格 (Yaacov Vertzberger)、南希·沃兹沃思 (Nancy Wadsworth)、史蒂夫·韦伯 (Steven Weber)、莉萨·维迪恩 (Lisa Wedeen) 和迈克尔·朱恩 (Michael Zürn)。

通过举办一系列研讨会，我们获知了这个研究课题的复杂性。在这些研讨会上，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这个课题的概念成形帮助甚大。在2004年2月杜克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里斯托弗·坎德兰 (Christopher Candland)、布鲁斯·卡明斯 (Bruce Cumings)、凯瑟琳·H·S·穆恩 (Katharine H. S. Moon)、任雪丽 (Shelley Rigger) 和史天健告知了我们许多关于东亚反美主义的情况。同年4月，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从下列学者那里获知了许多关于中东和非洲反美主义的信息。他们是：莉萨·安德森 (Lisa Anderson)、凯伦·乔杜里 (Kiren Chaudhry)、埃里克·尼斯比特 (Erik Nisbet)、法瑞德·法西 (Farideh Farhi)、乔纳森·霍华德 (Jonathan Howard)、奎因·米查姆 (Quinn Mecham)、戴维拉·考伦·莫勒 (Devra Coren Moehler) 和尼克·范·德·沃尔 (Nic Van de Walle)。同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举办的一次关于欧洲反美主义的会议上，约翰·伯恩曼 (John Borneman)、帕特里克·查姆瑞尔 (Patrick Chamorel) 和安德雷·马科维茨 (Andrei Markovits) 写下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

除了这些地区性的研讨会之外，我们还分别于2005年1月、4月和6月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举办了三次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与会人员就提交的本书章节草稿进行了批评和辩护，并作了整体修改。

我们许多同事要么参加了地区性问题研讨会，要么参加了章节草稿修改研讨会。我们非常感谢下列人士，从他们那里我们获取了真知灼见。他们是：瑞克·鲍姆 (Rick Baum)、拉塞尔·伯曼 (Russell Berman)、辛西娅·布兰特 (Cynthia Brandt)、帕特里克·查姆瑞尔 (Patrick Chamorel)、戴

尔·艾克尔曼 (Dale Eickelman)、辛西娅·爱泼斯坦 (Cynthia Epstein)、马修·埃万杰利斯塔 (Matthew Evangelista)、詹姆斯·费伦 (James Fearon)、彼得·费韦 (Peter Feaver)、克里斯托弗·吉尔平 (Christopher Gelpi)、朱迪思·戈德斯坦 (Judith Goldstein)、约瑟夫·格里科 (Joseph Grieco)、查尔斯·赫舒金德 (Charles Hirschkind)、戴维·霍林格 (David Hollinger)、约瑟夫·乔弗 (Joseph Joffe)、迈尔斯·卡勒 (Miles Kahler)、玛丽·卡赞斯坦、南纳尔·基欧汉、乔纳森·科什纳 (Jonathan Kirshner)、路德·库普曼斯 (Ruud Koopmans)、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D.Krasner)、托德·林德伯格 (Tod Lindberg)、巴拉克·门德尔松 (Barak Mendelsohn)、诺曼·奈马克 (Norman Naimark)、埃默森·尼欧 (Emerson Niu)、埃里克·尼斯比特 (Erik Nisbet)、玛丽·诺兰 (Mary Nolan)、苏珊妮·诺赛尔 (Suzanne Nossel)、山姆·波普金 (Sam Popkin)、劳伦·赖特 (Loren Rytter)、苏珊·舍克 (Susan Shirk)、尼克尔·斯皮尔达 (Nicole Speulda)、朱莉娅·斯威格 (Julia Sweig)、希伯利·泰尔哈米 (Shibley Telhami)、迈克尔·汤姆茨 (Michael Tomz)、克里斯·韦 (Chris Way) 和迈耶·扎尔德 (Mayer Zald)。

我们最为感激四位同事：彼得·古雷维奇、戴维·莱汀 (David Laitin)、亨利·诺 (Henry Nau) 和保罗·斯奈德曼 (Paul Sniderman)。他们提出的建议对于改进我们对本书的思考是无价的。

我们特别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林恩·盖尔 (Lynn Gale) 和肯·皮克 (Ken Pick)。林恩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市场纵览公司 (Global Market Insite, GMI) 数据的统计分析；肯无偿为我们提供了 GMI 的数据。我们感谢中心的同事们与我们进行了无数次交谈，在这些过程中，他们提出的深刻见解对我们研究的意义超乎他们的想象。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邀请我们将研究成果呈献给研究生、大学教师 and 外交政策专家的人士：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维诺德·阿加沃尔 (Vinod Aggarwal) 和史蒂夫·韦伯 (Steve Weber)，他们于 2005 年 3 月 29 日邀请我们与研究生进行了一场讨论；彼得·D·费韦和布鲁斯·詹特森，他们于 2005 年 2 月

15 日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组织了一场包括讨论反美主义的会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彼得·A·古雷维奇，2004 年 4 月 14 日，他邀请我们提交关于欧洲反美主义研究的一些成果；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的托德·林德伯格 (Tod Lindberg) 和“普林斯顿计划” (Princeton Project) 的苏珊妮·诺赛尔 (Suzanne Nossel)，2005 年 2 月 17 日，他们联合主持了一场“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的会议；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Munk Center) 的路易斯·保利 (Louis Pauly) 和贾尼丝·斯坦 (Janice Stein)，他们于 2006 年 2 月 3 日为本书开了一整天的专题会议；南加州大学的 B·彼得·罗森道夫 (B. Peter Rosendorff)，2005 年 4 月 28 日，他邀请我们介绍本书内容；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控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的斯科特·萨根 (Scott Sagan)，他于 2005 年 5 月 26 日邀请我们介绍本书的情况。

当我们找到肯尼特·本尼迪克特 (Kennette Benedict)，同约翰·D 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协商资助问题时，她对我们的诉求抱以极大同情。2004 年 12 月 2 日，在麦克阿瑟基金会主席乔纳森·范东 (Jonathan Fanton) 主持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基金会同僚们的评论使我们获益匪浅。

如果没有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道格·麦克亚当 (Doug McAdam) 在 2003—2005 年间对我们策划过程中的热心帮助，本书可能永远也不会付梓。在使得本书成为中心的一个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对他坚定的智力支持、后勤支持和个人支持以及中心工作人员和理事会的支持深表感激。应我们的要求，他作为作者参与了这个项目，撰写了后面的第 9 章。我们的学校——康奈尔大学和杜克大学（直到 2005 年 1 月 1 日罗伯特·O·基欧汉还是其中一员）——为我们的研讨会提供了慷慨的资金支持并且提供了有助于研究和思考的学术环境和教学环境。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两位匿名审稿人以深富洞察力的评论帮助了所有作者

准备各章节的最后版本。罗杰·海登 (Roger Haydon) 再一次证明了他学术作品出版界享有的盛誉名不虚传。约翰·雷蒙德 (John Raymond) 和凯蒂·梅格斯 (Katy Meigs) 的团队的努力再次表明, 编辑工作是可以转化成艺术的一项技能。卡伦·华 (Karen Hwa) 以她惯有的效率和善意监督了底稿的制作。萨拉·塔罗 (Sarah Tarrow) 做了大量工作进行最后的协调并确保本书能如期完工。

我们再一次感谢本书作者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的评论和批评。他们在研讨会上非常活跃, 以超越常规学术界限的方法通力协作, 共同致力于使本书作为一个整体而概念化。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 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 因为有了我们的妻子兼伙伴——玛丽·卡赞斯坦和南纳尔·基欧汉——而丰富多彩。她们的批评总是尖锐且富有启发意义。她们永远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她们将继续是我们生活的核心。

最后,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可谓人杰地灵。因此, 我们谨以此书献给中心, 期望未来若干年中会继续激发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创造性思考。

彼得·J·卡赞斯坦于纽约伊萨卡学院

罗伯特·O·基欧汉于普林斯顿大学

2006年2月

引言

反美主义政治学

1941年，亨利·卢斯（Henry Luce）谈到过即将到来的“美国世纪”。^[1]今天，政治学界的评论家们强调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许多观察家还认为，美国是伴随着冷战结束而产生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唯一获利者。约瑟夫·奈创造了一个容易记忆的词——“软实力”（soft power）来表明被尊崇的重要性，这样“别人就会追求你想要的”。^[2]奈认为美国掌握着大量的软实力。的确，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的成功导致其更被尊崇，这反过来又提升了其影响力，因而进一步促进其成功。

然而，历经60年的全球领导地位后，美国已远不再被世界普遍尊崇。“9·11”事件后，世界许多地方对美国和美国人民表达了深切的悲愤和同情。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2003年2月15日，世界便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群众游行，以反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对伊拉克的进攻。皮尤人民和新闻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简称皮尤研究中心）主持的对1.6万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1999—2000年和2002年同样被调查的14个国家中，2003年春季只有4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美国持赞成态度。相反，在1999—2000年和2002年夏季的调查中，上述同样的14个国家中，10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赞成美国的行动。^[3]2004—2005年冬季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2个国家中，16个国家的大多数或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对世界产生了负面影响；20个国家的大多数或大多数人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比

美国更具影响力将是一个积极的进步。^[4]通常被称做“反美主义”——对美国负面态度的表达方式——的思想，在包括“9·11”事件后公众舆论对美国表达了深切同情的地区已经广泛传播。

与他人对美国的评价表明了美国的特点一样，美国人对此类负面情感表达方式的敏感也表明了美国人的特点。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中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论：

在与陌生人交往时，美国人对于细微的指责和不足赞扬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们不停地折磨你让你赞扬他们，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们便开始自我赞扬。这似乎表明，他们因为怀疑自己的价值，从而希望不断地展现它们。^[5]

自2002年以来，海外急剧增长且毋庸置疑的反美情绪使得许多美国人深感焦虑。然而，这些情绪是否主要是对布什政府及其政策的反应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这还尚未明朗。为了区别反美主义的根本缘由和暂时原因，第1章中，我们由诸位评论家在国外社会不喜欢“美国是什么”和“美国做什么”之间作了区分。反美主义的暂时原因与美国的行为相联系，即美国的政策及其对他国的影响。反美主义更为深刻的根源与美国是什么有关。它包括这个事实，即冷战结束后，美国获得了不受挑战的军事强国地位，它在全世界进行军事侵略，这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帝国，无论从技术层面看它是否是一个帝国。反帝情绪在历史进程中再次爆发，就像古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帝国的历史经验所反映的那样。其他根本性的原因包括美欧双方民意在下列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如社会福利、死刑以及在诸如地雷和人权等议题上构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等。反美主义其他可能的深层次根源包括对美国财富、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全球化中主导地位的憎恨。

然而，反美主义过于变动不定，以至于无法确定它就是一个关于美国是什么的问题。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2年以后同样富有和强大，但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前些年反美态度不像现在如此广泛传播。同样地，美欧在福利国家等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那么，反美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本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呢？

本书对此类问题作出了解释。作者们通过运用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和多种方法来分析解释什么是反美主义。^[6]我们系统地运用了社会科学工具：从空间和时间角度详细研究了反美主义态度的概况；对于不同环境下形成反美主义政治的条件提出疑问；集中讨论影响反美主义的动因；探究了反美主义的政治影响；提出新的证据和解释来阐述这一重要政治议题的不同方面。编者详细阐述了各种情形下提出的问题，并且委托能胜任的作者加以解答。^[7]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反美主义的形式，以便使我们对其根源和后果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一篇通过研究反美主义的概念和各种类型的反美主义，以及对自1492年以前外国所持对美国意象的讨论，将反美主义置于美国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分析。编者所写的第1章仔细阐述了本书的概念性框架：我们着重强调了反美主义的多维性和异质性以及经常与之相伴的矛盾心态；指出了区分“观念”（opinion）、“不信任”（distrust）和“偏见”（bias）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发展了不同种类反美主义类型学。我们对反美主义多样性的强调解释了本书的书名。

我们的研究并非绝对地集中于反美主义。为了获得对于美国负面态度以及伴随这些态度的政治活动的全面理解，我们必须将反美主义纳入更为广泛的对美态度——正面的和负面的——的背景下。我们想知道，何种情形下，个人所持的对美态度会变成集体信念，以及何时反美主义话语和政策盛行。

为了理解反美主义，我们同样要理解美国主义。^[8]反美主义的多样性缘于美国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开拓者和移居者国家，美国呈现出一种非常宽泛的价值，从主导了全球流行文化主要方面的娱乐产业，到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独树一帜的突出的公众宗教虔诚。反美主义的异质性与美国主义的异质性相一致。美国是紧张和矛盾的集合体：强烈的世俗主义和强烈的宗教虔诚、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美国符号同

时指代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于不同社会的不同人或许有不同的吸引力，尽管它们相互矛盾，但甚至也能在同一时间吸引同一个人。此外，正如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第2章中表明的那样，自从1492年欧洲人第一次知道美洲的存在以来，美国一直就是魅力的主题和解读的对象。美国的海外意象与美国自我认识的意象一直平行改变，但这两者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反美主义和亲美主义——美国以外的人民对美国所持的态度——像赋予了美国生活以复杂性和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以多样性一样，赋予了美国丰富且各异的意象。美国人关于美国的争论通常也一样激烈：在其国家的许多方面，美国人自己也有分歧。我们需要记住，世界政治中许多代表了不同形式反美主义的冲突在美国政治体制中也有着强烈的共鸣。

大多数人在考虑研究反美主义时，他们关注的是经常在媒体上公布的民调结果。精心分析民调数据对于理解反美主义非常重要。本书第二篇便着眼于此。在第3章中，皮尔兰杰罗·伊萨尼亚（Pierangelo Isernia）研究了冷战时期欧洲对美国的观点以及他们如何在事态的压力下改变观点。经过大量成熟的研究，他认为，欧洲公众对于美国有着相当良好的认知结构，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欧美间可感知的文化差异，以及与美国士兵的直接接触对于形成他们对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这并不是暗示说反美态度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是深深植根于欧洲公众的意识中。事实上，伊萨尼亚的研究表明，1952—2001年间，欧洲人对于美国一直持相当赞成的态度。他们围绕一个水平——对美国表达赞成态度的人数比反对美国人数的两倍还多——波动。贾科莫·基奥扎（Giacomo Chiozza）在第4章中表明，自2002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涌现的反美主义是个新事物。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被调查的42个国家中，35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美国持赞成态度。^[9]在一份对皮尤2002年调查结果的详尽分析中，基奥扎认为，（这些国家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是多层面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很少有人整齐划一地不喜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倾向于对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美国社会的特征区别对待。中东对于美国的态度是非常负面的。然而，即使在这个愤怒的地区，因为对美国的态度是多层面的，因而他们对美国的总体判断也

会变化，这取决于美国不同方面可感知的突出性。

然而，仅仅凭民调数据无法使我们理解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的构成和活动、政治家们的政治战略，或者政府官员的政策追求。因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对反美主义政治研究要求一种更为语境的（contextual）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因此，第三篇转向对三个重要国家——法国、埃及和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以及伴随这些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活动的强化研究。在埃及的案例中，关注焦点是总体的阿拉伯世界——埃及是其主要组成部分。^[10]我们要求这些章节的作者们不仅要探究这三个国家总体上的对美态度，而且要讨论其他三类议题。我们让他们研究对其他国家或许不太重要，但相应国家特别关注且与美国相关的议题——诸如台湾地区对于中国大陆、巴以冲突对于埃及以及谷歌开发网上图书搜索引擎的计划对于法国等。我们还要求他们至少研究一个与美国没有明显联系的非政治性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探讨被热门政治议题所激发的反美主义对极其不同的活动领域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还特别要求三位作者研究各国对于2005年冬季美国领导的海啸营救活动的反应。在第1章中，我们将其作为区别对美国的负面态度与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或偏见的方法。^[11]

第四篇将研究主题从政治科学领域转移到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在第8章中，约翰·鲍恩（John Bowen）比较了印度尼西亚和法国的反美主义。他尤其熟悉这两个社会的情况。最近的民调显示，这两个国家对美国普遍持不赞成态度。鲍恩的研究形成了两个主要发现：负面图式（schemas）有助于构建不赞成态度；这些图式在法国——不仅是在穆斯林人群中——比在印度尼西亚更为根深蒂固。因此，印度尼西亚对美国的态度就比法国更易于改变。在第9章中，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将反美主义当做“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来进行研究。从这个视角看待反美主义，他对于反美主义情节（episodes of anti-Americanism）通常未曾预料到的长远后果，或者说遗产，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洞见：有时导致不信任或者偏见的制度化，另外一些时候情况恰好相反，产生超出人们预期的亲美倾向。

第二篇至第四篇的章节运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但是它们均持有一个共同观点。政府、团体，甚至个人采取的对美国的负面行为受个人态度影响，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中。但是态度不会直接导致行为。要想使反美主义具有政治影响，社会运动或者诸如政党这类机构必须将负面看法、不信任和偏见这三者的结合动员起来。这些动员能否发生很可能关键性地决定了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是否具有重大政治影响。没有此类动员，这些影响不可能持久。然而，没有一定程度的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不信任或偏见，政治企业家们就没什么可动员的。由于反美主义要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就必须将对美态度进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和自下而上的转移，本书就是研究这两种进程。

在第10章中，我们研究了反美主义的后果。通过新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那些人们可能期待发现的反美主义的具体和短期影响还尚未明晰。事实上，反美主义对于同反恐战争等议题相关的美国外交很少产生总体负面的后果，即使从各国在对待“自愿联盟”成员问题的态度上或者对美国的国际刑事法院（ICC）政策的反应中，也很难发现公众反美情绪影响的迹象。作为分析的结论，我们认为，那些声称反美主义对于世界政治具有即时和直接影响的人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反美态度对于政策具有间接和长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探究那些能够缓解或者阻止这些影响出现的条件。反美主义对于政治后果不具备短期和直接影响，并不意味着反美主义不重要。

反美情绪在不同时空的表现大相径庭。反美主义并非只有单一形式，相反，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反美主义。反美态度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政体各不相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韵律，随着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而跌宕起伏。反美主义可能长时间潜伏，然而，环境条件的突然改变或者蓄意的政策会激发它，使之对政府政策产生暂时的或者长远的影响，但是很少会产生即时和直接的后果。

在结论中，我们强调了由本书的研究和解释所引发的主要困惑。为什么会持续存在各种各样的反美主义？为什么反美主义的即时影响会受限制？一般地说，我们对这个困惑的回答要分析美国本身的特性。美国是一个“多价

体”(polyvalent)。它本身包含如此多样的价值观和多样的生活方式,使得它随时成为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反对或者赞成的对象。如同美国人将世界当做一面镜子从中审视自己——并且希望看到的是比现实中更完美的自己——一样,非美国人将美国当做一面镜子,从中可以反射出自己的希望、恐惧和不足。

【注释】

[1] Luce 1941.

[2] Nye 2002, 8-12.

[3] Pew Research Center 2005d and 2005e. 也可见 Politi 2003, Marquis 2003, Clymer 2002。

皮尤民调结果可在此网址查询: <http://www.people-press.org> (2006年3月16日)。

[4] PIPA 2005.

[5] Tocqueville 1994 [1835], 252, quoted in Toinet 1988, 137.

[6] 反美主义最近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包括 Markovits 2006, Behrens, von Klimó, and Poutrus 2005, Judt and Lacorne 2005, Steinberg 2005, Levy, Pensky, and Torpey 2005, Telhami 2005, *Economist* 2005a and 2005b, Rubin and Rubin 2004, Hollander 2004b, Markovits 2004a and b, Berman 2004, Ross and Ross 2004, Ceaser 2003, Sardar and Davies 2002, Shiraev and Zubok 2000, Kaase and Kohut 1996, Granatstein 1996, Kroes and van Rossem 1986, Rubinstein and Smith 1985, Haseler 1985, Rubinstein and Smith 1985。

[7] 这项研究计划耗时18个月,召开了6次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中,一大批博学多才的专家对本书不同章节的草稿进行了评论,使得本书不断修改并获得极大完善。

[8] Hertsgaard 2002, Ceaser 1997, Rosenberg 1982, Gerbi 1973, O' Gorman 1961.

[9] Pew Research Center 2002, 53-55.

[10] 为了保持连贯性和限制主题使之能在一本书中充分讨论,我们集中研究欧洲、东亚和中东,省略了对已经有很长反美主义历史的拉丁美洲和总体上对美国抱有相当积极态度的非洲的研究。

[11] 因为这非常切题,关于法国和中国的章节同样考察了反美主义背景下的消费行为,我们在第10章的几个研究主题中也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探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

第 1 章 反美主义多样性：一种分析框架

6/ 反美主义概念构建

7/ 图式、认同和规范

10/ 多维性和矛盾性

14/ 观念、不信任和偏见

19/ 海啸救援作为准实验

24/ “反美主义”类型学

31/ 恐惧的作用

32/ 反美主义的历史维度

34/ 反美主义：多重视角

第 2 章 想象美国：无限希望和挑战

第二篇 公众对美国的态度

第 3 章 冷战时期欧洲的反美主义

64/ 欧洲人如何看待美国

81/ 冷战期间反美情绪的周期

85/ 冷战时期（仅研究 1952—1970 年）对美国的态度

100/ 旁观者眼中的反美主义

第 4 章 解析反美主义：个体对美态度分析

110/ 五个地区 2002 年对美国看法的模型

137/ 2002 年以后伊斯兰民众心中的美国意象

140/ 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多重认知